

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中介 ——论判断力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李婉莉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摘要] 康德写作《判断力批判》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弥合前两个批判之间的裂缝,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从而完成他的整个批判哲学体系。康德通过判断力来解决这两者的沟通问题。在他看来,若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建立联系,必须以实践理性为主导,用实践理性的自由影响理论理性占统治地位的经验领域。但是,若要沟通彼此,尚缺一个中介。而反思的判断力是可以担当此任的。反思的判断力之所以能够作为联结彼此的中介,关键在于它的一个先验原则——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正是因为这一原则,我们才能够将自然界看成一个由低到高不断进展的目的系统,因而使得从自然到自由的沟通成为可能。

[关键词] 判断力; 合目的性; 客观合目的性

[中图分类号] D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06)02-0077-06

本文着重考察判断力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众所周知,康德写作《判断力批判》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弥合前两个批判之间的裂缝,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从而完成他的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然而,在探讨判断力究竟怎样沟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时候,有些人比较关注《判断力批判》中关于审美判断力批判这一部分,认为对于这一部分的批判已经达到了沟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目的。显然,这种观点忽略了《判断力批判》的目的论部分,而恰恰是这一部分才是沟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键所在。有鉴于此,本文将谨慎地分析审美判断的沟通作用,同时将重点放在对目的论判断力批判的探讨之上。

一、判断力

有些意见认为,判断力之所以能够沟通知性与理性,原因在于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就是作为认识能力与欲求能力的中介存在的,判断力的出现恰好使知、情、意得以统一。然而,在判断力沟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过程中,情感能力虽然重要,但关键还是判

断力的先天原则——合目的性原则,后者才是理解判断力怎样联结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钥匙。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就在于《判断力批判》关系到康德完整的批判哲学体系,关系到康德哲学的基本精神,亦即康德哲学的主旨。

(一)康德哲学的主旨

康德哲学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始终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亦即在森严的自然法则的统治之下,人类理性有没有不同于一般自然存在物的价值与尊严,有没有自由的问题。

康德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是以“哥白尼式的革命”为出发点进行的。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起因于知识与对象关系的颠倒。以往我们在认识对象的时候,总是希望一切知识必须与对象一致。这也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路。但是,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并不能说明知识的真理性或普遍必然性。因为这种认识对象的方式是主张我们能够按照事物本身所是的样子表象事物、认知事物。但是,我们并不能将事物的属性搬到我们的表象能力里面来,因此这种认识对象的方式并不能获得普遍必然的知识。

康德以“哥白尼式的革命”为出发点,限制知识为

* [收稿日期] 2005-09-21

** [作者简介] 李婉莉(1996—)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2003级博士生。

道德自由保留了一席之地,将形而上学从危机中拯救了出来,在自由的实践领域重新树立了它的尊严和地位。但是,问题并没有就此了结。这是因为,当“哥白尼式的革命”让“对象必须符合知识”,事物出现了“如其所现”和“如其所是”两个方面的时候,世界也就此分成“自然概念的领地(现象)”和“自由概念的领地”(实践领域),也即感觉世界和理智世界,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并不存在构成一体的可能性,二者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二)实践理性相对于理论理性的优先地位

康德对于两个世界的沟通问题的解决,是通过沟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来实现的。在他看来,在感觉世界中理论理性为自然立法,而在理智世界中实践理性为自身立法。可见,感觉世界和理智世界的法则植根于理性的先天立法结构之中,因而两个世界分离的根源也仍然需要在理性本身那里寻找。

那么,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是否存在沟通的可能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关注康德确立的实践理性相对于理论理性的优先地位。在理性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这两种功能中,显然,我们不能给予理论理性以优先地位,如此一来,理论理性将统治实践理性,作为理性存在的人将完全受自然法则的支配,失去其应有的尊严与价值,失去自由。但是,给予实践理性以优先地位,却是可行的。而且惟其如此,才能够真正体现人之为人,人不同于一切自然存在物的价值与尊严。因为只有当实践理性统治理论理性,现象统一于本体,必然服从于自由的时候,人类理性才超越了自然的限制,自己决定自己,达到了自由的境界。

康德确立的实践理性相对于理论理性的优先地位,实际上也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沟通的原则。若在感觉世界与理智世界之间建立沟通,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建立联系,首先,从理论理性过渡到实践理性,从“现象界”通达自在之物的领地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理论理性所属的经验领域里,我们永远都无法认识、无法触摸到现象背后的物自体!

但是,当我们确立了实践理性相对于理论理性的优先地位,以实践理性统治理论理性,从后者出发,通达前者,这条途径却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尽管感官世界是经验的领域,在这里一切都需要服从机械因果规律。但是,自由的实践领域却应当能够影响到经验领域。因为在实践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并不是机械因果规律,而是目的因的自由因果规律,所以它有可能将目的颁布给自然,使自然在机械因果律之外,还可以

成为一个合目的的系统,从而使自由的实践领域影响到经验领域,达到沟通。

康德为我们寻找到的这个中介,就是体现目的性原则的判断力。

(三)反思的判断力及其先验原则——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

一般来讲,判断力是指把特殊思考为包含在普遍之下的能力^[1]。康德将判断力分为规定的判断力和反思的判断力两种。规定的判断力带给我们的只是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和原则,而自然界毕竟是千奇百怪、无限多样的,在为这个千差万别的自然界一一提供规律的时候,规定的判断力显然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怎样才能从自然多种多样的现象和变化中找到普遍的规定,怎样为这些特殊寻找普遍,这个问题需要反思的判断力来解决。反思的判断力正是要从自然中的特殊上升到普遍,从纷繁芜杂的自然出发,为千差万别的特殊寻找一些特殊规律。

但这样一来,我们必须为反思的判断力寻找到一个先验原则。这是因为,规定的判断力是将直观杂多归摄在知性所予的自然法则之下的认识能力,它本身没有特定的法则,而是在知性的先验原理下工作的,可以说,知性本身就是下判断的能力。所以,当我们运用规定的判断力将特殊归摄在普遍法则之下的时候,实际上是知性把这些普遍法则颁布给特殊,将规律颁布给自然。而知性为自然立法,对象通过理性的认识形式而为我们所认识,从而形成客观有效的知识,这一过程的合理性已经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得到证明了。但是,就反思的判断力为千差万别的特殊寻找特殊规律来说,这一过程却没有现成的原理可以依据。因此,为了保证无限多样的事物能够归属于统一的自然秩序,反思的判断力需要一个先验原则作为其反思这些事物的基础,使反思活动有根据可循,言之成理。

这个先验原则就是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

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是反思判断力的一个先验原则,也是使判断力能够成为沟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中介的关键所在。对于无限多样、千奇百怪的自然界的特殊事物来说,也许规定的判断力无法为它们一一地提供规律,但是,我们却可以利用反思判断力的“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将纷繁芜杂的特殊事物看成是“合目的”的,也许这些特殊事物在其他方面再没有共同点可以分享,然而它们却有可能在“合目的性”上走向一致。因此,“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使我们能够将自然看作一个无限多样的种类相互隶属从低到

高进展的目的系统。它使得自然界在机械因果规律之外,还能够遵循“合目的性原则”而成为一个合目的的系统。又因为,自然这个合目的的系统所遵循的是一种“内在目的”,而不是外在的目的或手段,所以我们发现“内在目的”使得自然在机械因果规律之外,还被看成有另一种因果律——“目的因果规律”存在,从而使得自然到自由之间的过渡成为可能。

二、主观合目的性

自然的合目的性包括“形式的合目的性”与“质料的合目的性”,亦即主观的合目的性与客观的合目的性两种,它们或者是自然的合目的性的美学表象,或者是自然的合目的性的逻辑表象,前者是《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判断力批判”部分,后者是“目的论判断力批判”部分。

(一)主观合目的性作为联结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中介是如何可能的

康德对美的分析是从审美判断入手的。他在对美的分析中,不是从对象本身的客观特性入手分析美的特征,而是从主观出发分析美感产生的主体条件,因而其对美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审美判断的分析。正因如此,我们选择康德对美的分析作为切入点,来研究审美判断在沟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中的作用问题。

康德主要是通过四个契机,即从质、量、关系和样式四个方面对美进行分析。

从“质”的方面看,美是无利害无功利的。仅仅是一个对象的表象就可以在我们心中伴随有愉悦,即便这个表象的对象之实存对我们来说是无所谓的。

从“量”的方面看,美是一种没有概念的普遍性。审美判断不能是一种概念上的判断,尽管从概念而来的判断可以是普遍的。美是主观的、个体的,同时又是普遍的,那么美的普遍性来自于何处呢?这个问题,还是离不开美的无利害的特点。因为,如果我在审美过程中感到了客体的美,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并不牵涉到任何利害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完全自由的,那么,我就有理由要求他人也和我一样认为它的美的。

从“关系”的方面看,美是没有目的的合目的性。审美判断与其对象之间没有利害功利的关系,因而没有客观的目的。但是审美对象又的确符合了我们的主观意愿或目的,所以从主观的合目的性来看,它又是有目的的。这里所说的主观合目的性,实际上就是

形式上的合目的性。

从“样式”的方面看,美是没有概念的必然性。在这里,审美判断的必然性是一种示范性,即一切人对于一个被看作某种无法知名的普遍规则之实例的判断加以赞同的必然性^[1]。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康德对美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审美判断的分析。因而,我们同样可以将这四个契机赋予审美判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审美判断与实际的利害无关,因此不同于实践的功利活动;与概念无关,因此不同于逻辑的理论活动;也与客观的目的无关,因此不同于道德上的善。在审美判断中,作为先天直观能力的想象力与作为概念能力的知解力得到协调与统一,从而使审美判断如同康德所分析的“美”一样,虽然是主观的、个别的,又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这样一来,我们发现,审美判断虽然是对自然的静观,在自然中受知性的必然法则支配,但由于它只是单纯对对象的形式进行直观和领会,并非涉及对象本身,所以这种静观又是一种对自然的无涉功利的自由观照,在这样的自由观照中,想象力与知解力得到谐和一致、自由嬉戏,此时主体既摆脱了知识理性的束缚,又超越了对自然物质的欲求依赖,自由地创造并感受着对象的审美形式,因而使得受知性法则统治的不自由的自然,在审美判断中成了想象力自由活动的领地,正因如此,必然与自由、现象与物自身也在审美判断中沟通了起来,取得了和谐和统一。

(二)主观合目的性作为联结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中介的局限

然而,在审美判断中,主体获得的自由毕竟是有限的,自然与自由的沟通也是很有限的。这是因为,此时,客体符合的仅仅是主观的合目的性,纯粹形式的合目的性。主体在审美判断中获得的自由,只是主体内心体验的自由。这种伴随审美判断而生的自由对自然毫无影响。因此,如果仅仅以审美判断来达到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沟通,那么,人仍然是森严的自然法则之下与一般自然存在物无差别的存在,仍然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

的确,在审美判断中,康德最终使知、情、意得到了完整的说明,完成了对人类主体的心智能力的批判和考查。而三大批判之所以全部命名为“批判”,其目的正是为了对一般理性能力进行考查和分析,确定形而上学是否可靠,以及它的来源、范围和界限。从康德对理性的批判工作来看,我们有理由断言审美判断沟通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使康德的哲学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一个由知、情、意的先天原则构成的

完整体系)。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尽管康德对于理性的批判工作是通过知、情、意一一展开的,但是,康德哲学希图达到的目标,却不仅仅是一个这样的体系而已。康德在进行理性的批判工作的同时,还在进行着其哲学体系的构建和设想。他始终希冀“限制知识为道德自由留地盘”,在实践领域重建形而上学,让实践领域的自由影响自然,从而还给人类应有的尊严和价值。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当康德完成了对人类主体的心智能力(知、情、意)的批判之后,其哲学的最终目的尚未达到。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继续走下去,开始对目的论判断力的探讨。

三、客观合目的性

若沟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仅仅确立了实践理性相对于理论理性的优先地位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假设自然界不唯一种机械规律在起着作用,还要有一种合目的的系统作为条件。因此,我们必须把自然看成是一个目的系统,而且,我们不仅要把自然界看成合目的性的存在,这个被我们看作一个目的系统的自然界还必须以自由的目的活动——道德作为最根本的目的、“终极目的”。只有这样,我们才算真正完成了自然领地与自由领地之间的完全的沟通,才算完成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完全的沟通。

(一)自然的内在合目的性

康德认为,一个对象的概念,就其同时包含着这个对象的现实性的基础而言,叫做“目的”,这里的“目的”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目的”,它意指在一事物的概念(本质)之中包含着它自己的内在可能性的根据,亦即一个事物的形成与发展不取决于任何外在的因素,而是凭其内在必然性而实现的。

同样,自然在客观上的合目的性也是一种“内在合目的性”。所谓“内在目的”,是一种不同于机械因果关系的特殊因果关系,是一种目的因的因果关系。在机械因果关系中,是一种构成一个不断下降的系列的联结,其中作为结果的事物是以另外一些作为原因的事物为前提的,它们本身不能反过来同时又成为另外这些事物的原因。而在目的因的因果关系中,原因与结果不是分离的两个不同的事物,而是内在地结合于一个事物之中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回事,亦即它意指一个事物同时是自己的原因而又是自己的结果,这种自然目的就是一种“内在目的”。

按照“自然的内在合目的性”,我们可以推论出作为“组织的”和“自组织的”的“自然目的”的存在,这种

“自然目的”是以往我们单凭机械因果关系无法说明的,而且它还将栖身在实践领域中的“目的因的因果关系”赋予了自然。从中我们看到了沟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希望。但是,这种显示出夺人魅力的“自然目的”是否在自然中真实地存在?或者说,它会不会只是康德为了沟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而提出的一个设想或理想?

回答这个疑问并不难。因为,尽管在自然界中唯一能够得到证明的客观规律是机械的自然规律,但是我们的确也发现了某种除非作为自然目的是不能想象为可能的事物,这就是“有机体”。一个有机的自然产物是这样的,在其中一切都是目的而交互地也是手段。在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白费的,无目的的,或是要归之于某种盲目的自然机械作用的。虽然在自然中有机体的存在只不过是一个特例,但是,它却表明单纯按照机械规律来说明自然已经不够用了,因而仅仅为了说明它的存在我们就必须引入目的的概念,这就为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提供了客观的基础。因为我们只有将整个自然也看成是一个有机体或者目的系统,才能合理地说明有机体这个自然的特殊产物存在的必然性。当我们把事物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时,自然在其有机的产物中给我们提供的例子,就使我们有权利,甚至鼓励我们将自然“看作”是合目的性的体系。

(二)自然的最高目的

康德在哲学史上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使哲学的发展深入到了“批判”的维度。在康德这里,“批判”是对一般理性能力的考查,而对一般理性能力进行分析考查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形而上学是否可靠,确定它的来源、范围和界限。

正是从“批判”的角度看,当我们探讨到自然的客观合目的性,探讨到“目的论判断力的辩证论”部分的时候,《判断力批判》的正文在此结束,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判断力”的批判工作已经完成,对判断力的考查已经完毕。但是,尽管对于理性的批判工作已经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康德哲学体系的建构工作也已经完成。或者说,若要沟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使康德的哲学形成一个完成的体系,我们不能在康德对理性的批判工作完成之处就此止步。我们还需要把目光投诸于《判断力批判》的“附录”——“目的论判断力方法论”部分。事实上,康德也正是利用这一部分着手解决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沟通问题,以及其哲学体系的统一问题。

康德在“目的论判断力方法论”中集中探讨了自然的“最高目的”以及“终极目的”问题,并且由此而提

出了一种不同于自然目的论的“道德目的论”。

自然的“最高目的”应该是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为之而存在的目的,而且是自然目的系统的顶点,这个“最高目的”只能是人。“人就是这个地球上的创造的最后目的,因为他是地球上唯一能够给自己造成一个目的概念、并能从一大堆合乎目的地形成起来的东西中通过自己的理性造成一个目的系统的存在者。”^[1]

既然人是自然的“最高目的”,那么,这个“最高目的”在人身上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康德认为,自然的“最高目的”就是人的文化。这是因为,如果自然的最高目的必定在人之中,它应该通过人与自然的结合得到促进,那么它就必须或者是这种方式的目的,即通过自然对人的慈善就能够使他得到满足,或者是对各种目的的适宜性和技能,从而使各种目的能够应用于他的(内在的和外在的)自然之上。前一种自然的目的可以称为人的幸福,后一种自然的目的就是人的文化^[1]。幸福是人在世上的一切目的的“质料”,如果幸福成为人的全部目的,那么以此为基础的“最高目的”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因为幸福的本性决定了其不具有在任何地方停止并满足于占有和享受的性质。更何况幸福仅仅依靠自然的恩赐,但是自然却远不是把人当作它的特殊宠儿,厚待他超过其他一切动物。于是,人在自然中的一切目的就只剩下一种形式的、主观的条件,这就是一种可以适合于任何目的的“适宜性”:人独立于自然而自己设定目的,按照他的自由目的的各准则将自然中的一切作为手段来使用。而人对任意目的的适应性以及自由的产物,就是文化。人的文化是自然的“最高目的”,亦即自然这个目的系统进化的最高层次,自然就在人的文化之中得到了充分的自我实现。

(三)创造的终极目的

所谓“终极目的”是这样一种目的,它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作为它的可能性的条件,它在目的秩序中不依赖于任何别方面的条件,而只依赖于它的理念。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无条件的目的,换言之,它是目的的目的或自身目的。如果自然可以看作是个目的系统,那么它的等级系列不仅需要“最高目的”,而这个“最高目的”亦需要“终极目的”作目的论的说明,否则这个目的系统还不能算完成。但是,对于这个“终极目的”,我们不能指望在自然之中找到。因为在这里,我们将陷入自然的目的链条的无穷推演之中。因此,若要想为自然设定一个“终极目的”以完成这个目的系统,我们必须在自然之外以某种超自然的东西来说

明它。也就是说,这个“终极目的”不仅与自然有联系,它还要具有超验的品格。

这样的“终极目的”,只能存在于人之中。或者,更加确切地讲,这个“终极目的”只能是人的道德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中只有唯一的一种存在者,它们的因果规律是目的因的,亦即指向目的的,而且为它们确定目的的法则则是它们想象为无条件的和不受自然制约的,并且是必然的。这种类型的存在者就是人,但却是作为本体看的人。因此,人的道德就是创造的“终极目的”。“没有这个终极目的,相互从属的目的链条就不会完整地建立起来;而只有在人之中,但也是在这个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之中,才能找到在目的上无条件的立法,因而只有这种立法才使人有能力成为终极目的,全部自然都是在目的论上从属于这个终极目的的。”^[1]

(四)客观合目的性作为联结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中介是如何可能的

若要达到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沟通,我们必须将实践领域的目的赋予自然,让实践领域的自由、道德影响自然。我们已经通过自然目的论说明了自然本身是一个目的系统,并且,还为自然目的系统找到了“最高目的”——人。这是因为,普天之下,自然万物,只有人的生存根基中有一种无条件的目的可以充当创造的“终极目的”,这就是人的道德存在。不唯如此,人之所以能够作为自然的“最高目的”而存在,还因为唯有人这种有限的理性存在,才具有自由的意志能力,而当人作为自然的“最高目的”,亦即自然的一切事物都以人为目的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将自身禀赋的自由影响到自然,从而使自然与自由之间达到沟通的目的。

然而,人类理性虽然是自由的,但其自由仅在实践领域有意义,对它来说,自然是他律的世界,若要道德法则在自然中成为现实,它就必须以自然中的一切都符合它的要求为条件。而且,道德法则为人类理性所确立的“终极目的”——至善,乃是德性与幸福的和谐一致,道德与自然的结合统一,而这就不是仅凭人类理性的能力所能够实现的。因此,为了确保“终极目的”的实现,确保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最终沟通,我们必须假定一个道德意义的世界原因(一个创世主),以便使我们按照道德法则的要求确立一个“终极目的”。只有确立了这个世界原因即上帝的存在,我们才有理由将自然看作一个完整的目的系统,并且与我们的道德目的符合一致。于是,道德目的论就补充了自然目的论的不足而第一次建立了一

种神学,这就是“道德神学”。而正是“道德神学”的保证,才使“终极目的”得以实现,并最终使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沟通亦即两个世界的沟通成为可能。

如果没有人类存在,即便世界怎样繁花似锦,生趣盎然也只是一片没有“终极目的”的浩渺荒野。而人类的存在之所以使世界变得格外有“意义”起来,恰在于人的实践理性(道德能力)。这是因为人对世界的认识所能发现的都只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东西,唯有在道德活动中才能见到无条件的、绝对的自由。但是,我们以往谈到理性的时候,却纠缠在理论理性中,忽略了实践理性,这样的结果只会把人降低到一般存

在物的水平,除了恪守机械因果规律,恪守自然法则,再无自由可言。康德正是希图限制知识为道德自由保留地盘,重新树立人的尊严。当我们跟随康德的思路到达“终极目的”的时候,我们发现,有“道德神学”保证的“终极目的”不仅最终使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沟通亦即两个世界的沟通成为可能,而且也使得康德哲学的主旨最终得到贯彻。

参考文献

[1] 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3,73,284,287,293,294.

The Bridge of Theoretical Reason and Practical Reason——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Judgement in Kant's Philosophy

LI Wan-l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Critique of Judgment is to reconcil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wo other Critiques, to construct the link betwee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ason, and then to complete his whole critical philosophy system. Kant resolved the problem by appealing to judgment. According to him,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two realms originates from reason itself. So the link between them mainly lies in realizing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alm. Kant established the privileged position of practical reason, that is, the practical reason must be predominant if the relations are to be built betwee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ason. But the direct relations are not built, it needs a link between them. Judgment, more accurately, reflective judgment, can play the role because of its priori principle—the principle of natural purposiveness. According to this principle, we can see the nature as a developing teleological system and then make the link possible from nature to freedom.

Key Words judgment; purposiveness;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中介——论判断力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
和作用



作者：[李婉莉, LI Wan-li](#)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刊名：[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6, 8 (2)

参考文献(1条)

1. [康德; 邓晓芒 判断力批判](#) 2002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602018.aspx